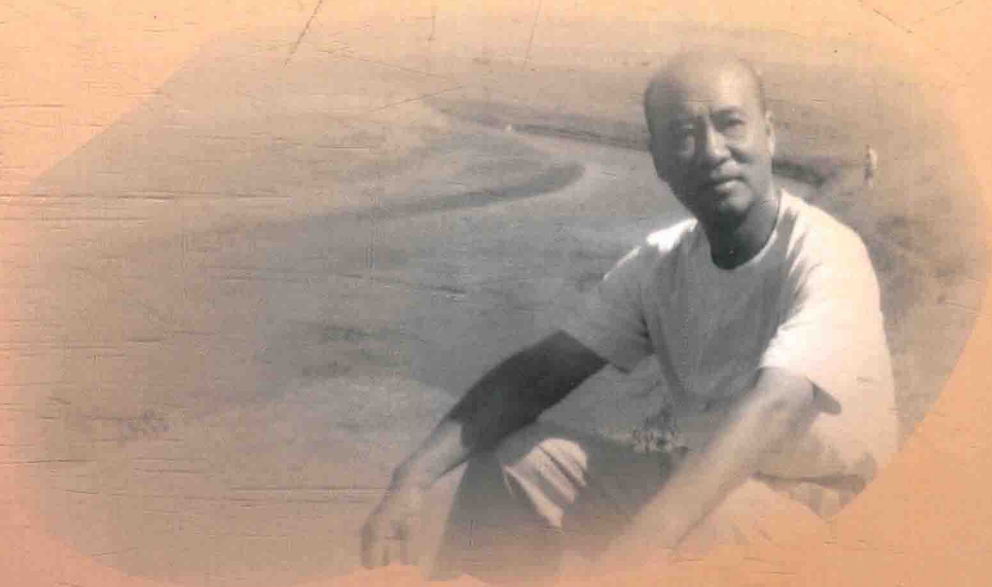


小写历史

——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

XIAOXIE LISHI — YIGE PUTONGREN DE LIUSHINIAN

董惠民 著



小写历史

——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

董惠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写历史 / 董惠民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08-4212-2

I. ①小… II. ①董… III. ①董惠民—回忆录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1018号

小写历史——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

作 者 董惠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浙江湖州新天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9.75
字 数 6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212-2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家人亲友、同学同事，

献给一直抚养我的故乡——湖州。

序一

那些“小写历史”中的“大写时代”

王旭烽

读完了董惠民长约六十万字的《小写历史》，我陷入不可自拔的追忆。一根火柴点燃了另外一堆柴火，然后再依次点燃下一堆，再下一堆……每一堆生命之火都是孤独地在燃烧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各自对方的光亮与热度，哪怕知道也无法体验，因此他们终究还是孤独的。

但文字将灵魂彰显了出来，董惠民也将自己的生命史，仔细周详地叙述了出来，于是唤起了我们对自己生命历程的蓦然回首。许多藏在骨髓深处的呼应跳跃出来，对着这小写的历史不停地惊异地说：啊！原来您也有这样的经历。原来我们曾经这样相同。哦不，为什么我竟然不知道您曾经有过的这一切呢？您可是我的老大哥、我的老同学、我们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被称为现象的同时代人啊！

我们班的同学若从年龄上说，分成三大板块，以金儒宗等人为代表的老大哥人群；以宋卫平等人为首的中间年龄人群；以黄永红等人为首的年龄偏小人群。董惠民和我分别忝列老大哥与中间年龄段内。七十位同学今天一个不少，全都健在，这也算得上我们的1977级现象了吧。

记得湖州来的董大哥，大一时亦不过三十岁，是个货真价实的帅哥：黑白大眼睛，雄伟络腮胡，一头油亮黑发，肤色黝黑但清洁健康。他操一口湖州腔国语，语速极快，上来就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如何如何”，这自嘲的“老家伙”，又貌似透着一股子自命不凡。而且，他入大学时，身高、体重都相当标准，以至我无法想象他回忆录中将青少年时代的自己定位在矮个子的那种边缘情态。

由于他总是强调他是个“老家伙”，以至我们最后终于被他折服，承认他是“老家伙”了。而“老家伙”是有特权的。比如董大哥结婚了，他的夫人居然姓“劳”，这是多么奇怪的姓，生一个女儿应该随母叫“劳拉”吧。劳女士来探亲，我们去探劳女士，一致承认是个美娇娘。然后董大哥就开始苦恼于他的失眠，最后终于和今天已经在美国的梅宇同学调换了住宿，每天骑着自行车来上学了。接着董大哥开始再一次得寸进尺，强调他的俄语生涯与他目前的英语学习是如何地不配套。总之他最后获得了免修英语的资格。

在我的印象中，董惠民就是这样一个贴着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行走的湖州人老大哥。在学校我跟宋卫平他们属于一伙，每次要弄点动静出来，老董总是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用一种心有余悸的过来人口吻说：“你们不懂的，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知道他是完全有能力进入宋卫平一拨，去呼时代之风唤命运之雨的。但他不，他选择了过一种小日子。大学毕业后他自然回到他的鱼米之乡——湖州，当他的师范学院历史老师去了。

直到读了他的《小写历史》，我重新认识了同学董惠民。

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就内容而言，以回忆录的方式，以个人的视野，却又以一个严谨的历史研究者观察时代的方式，记录下几个大时代转折的兴亡，并将其本人完全纳入其中。仿佛随波逐流的命运，却承载了大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主要生活形态的客观性。这是一种大多数人的命运，捉襟见肘的贫乏精神，疲于奔命的招架应付，一地鸡毛的琐碎世界，貌似平庸的市民形态，在生活面前暴露出来的全部的生命窘态。但恰恰是这样的历史絮叨，与那个大时代的宏大叙事相辅相成，构成特殊年月的荒唐与荒谬。就我的阅读而言，董惠民参与弥补了整整一个时代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话语空缺，他是他们的代言人。

我还想赞许董惠民非常严肃非常正面地与历史老人对视的勇气。所谓的小写历史，但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大时代中的小接轨，这是一些聪明的作家往往会非常聪明地跳跃避开的。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小，承载不了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难以构成所谓的史诗品格；其次是它们的难，越小越难熟悉，越不熟悉越难以传递，越难以传递越想绕开算了。但董惠民一个一个地按部就班地叙述下来，不放过历史的每一个环节，因为少了

任何一个环节，小写的历史就不是真正的“小写历史”了。

作为一个小说写者，我最想表达的还是董惠民的这个文本，他的确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德莱姆的代表作《第一口啤酒》。全书所描写的全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作者写垃圾，写墨水漏痕，写餐具上的图案，写闭上眼睛时眼皮后面不断变化的光斑，写打手机时微斜着脑袋的姿势，写在车站迎接朋友时小小的担心，写进酒馆前最后慢下来的几步，细致而传神地描绘了面对啤酒将饮未饮时一瞬间的意识流动。古往今来，天地宇宙，都汇集在这一时“苦涩的幸福”之中。作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唤醒当代人对无所不在的美的发掘与品味，从而丰富了人们日渐疲乏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德莱姆善于在寻常生活中发现微小的题材，是因为他以为“短文是与人们想停止的时间的一种关系”，作品因此启示人们认识到“快乐就在细微之处”；而董惠民的《小写历史》能够给予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启示：他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正是“历史就在细微之处”。因此一部约六十万字的作品，是由大量的客观描写集成的，没有太多的心理活动和主观剖析、浪漫与夸张的抒情，对外部世界则有极为详尽的叙述，仿佛回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代。因此，文字传递出来了那个特殊的时空、色彩、声音和节奏，是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极好的研究文本。

作为作者的老同学，这次阅读的经验还给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这部小写的历史让我开始意识到，我所熟悉的董惠民，很有可能是我陌生的董惠民。比如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敞开着的人，一个因为小心翼翼而不曾有过大痛苦的人，但是，我怎么就完全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早夭的婴儿呢？人们往往用喧闹来掩饰内心不可触摸的凄凉，而这些不可诉说的隐秘，却可以通过文字的通道倾诉出来——这正是《小写历史》的重大价值吧。

2015年9月23日 于杭州

(王旭烽，女，1955年出生。国家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茶文化学科带头人。其代表作品《茶人三部曲》获1995年度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八五”计划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序二

清醒与超脱

——《小写历史》的“读后感”

包伟民

老同学董惠民教授写了一部回忆录，《小写历史——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约洋洋六十万言，用电邮发来给我。我当然大感兴趣，坐在电脑显示屏前一口气连看了几天，直看得双眼生疼。谁知道老董还命我为此“写点什么”，实在拗不过他，在这里写几句自己的“读后感”。

老董自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以只能“小写历史”，我不太同意——先来跟老同学抬抬杠。

梁任公曾批评我国历代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实际上非独帝制时期的中国史如此，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史学也莫不如此。传统的历史学都是帝王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小民百姓、芸芸众生，无论是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奴隶，还是修建长城的中国秦代黔首，哪有一人一名被记载下来的？不过，自从梁任公所鼓吹的“新史学”发轫以来，至少在学界的认识上已经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简单归纳过近代历史学从20世纪中期起的发展历程，认为是从经典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趋势有二，其中之一是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而这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试图从传统的以帝王、英雄为主的历史，走向基层，走向以民众生活为主的社

会历史。

毕业以后，我与老董一样，习史为业。一直感慨我国的存世文献虽然号称汗牛充栋，但若真想找一些关于旧时民众日常生活的资料，就会发现在很多方面竟然还不及外国的史籍。近代以来，各种资料大增，直至今日进入信息过剩的时代，但相比于其他方面，关于社会基层的记载仍然是不够充分的。老董的这部回忆录，以他个人的视角，记载了六十余年来中国民众社会生活许多极有意义的资料，例如他所写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一些经历就是如此。

我比老董小几岁，“文革”开始时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许多“历史性事件”尚无资格参与，但作为旁观者，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后来又读了不少关于“文革”的历史资料，了解得更多了。但是，当我翻到《北京不欢迎我们》那一章，读到1967年9月老董与几位年轻男女学生再度赴京“串联”，却一路被“劝阻站”阻挡时，就不得不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了。我想，被老董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的当时各地“劝阻站”的运作情况，包括他们这些年轻学生被“劝阻”时的心情，与其一路逃票翻墙，最终辗转到达北京的经历，就是当时的报刊与花样繁多的宣传册子，也未见得留有文字记载的。而这一切，当然都是我们今天研究“文革”历史时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一部《小写历史》，似此令人读来不能释手之处多矣。

老董自谦，谓之“小写”，我则以为“普通人”的历史，实可谓之“大写”。

利用个人回忆录的资料来观察历史，有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叙述者出于个人的立场与视角，反映的史实常常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与局限性。不过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更体现出了老董这部《小写历史》的价值。

老董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三十余年，作为一个正宗科班出身的历史学教授，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一种相当清晰的历史感，虽然有时也不免情感大发，例如他记述自己儿时各种游戏时就是如此，却一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超脱。于是，我们在这部“普通人”的回忆录中，就既可以发现作者对自己的某些回忆，以一种专业的水准作出考证与资料补充，对一些看似极细小的个人生活经历，站在“家国天下”的高度所作的观察与评判，以及对某些可能的记忆偏差作出冷静的修正。例如他对那位湖州老太太关于他父母

婚礼的描述所作的判断就是如此。

西哲黑格尔曾说历史感是人类理性的基础，此语深得吾心。一个平凡的人，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容超脱地观察自己的一生，其所表现的历史感，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局部，这就是理性。

2015年9月15日 于北京

(包伟民，男，195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宋史中心主任，2012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一：那些“小写历史”中的“大写时代”	王旭烽
序二：清醒与超脱——《小写历史》的“读后感”	包伟民
一、普陀山逃走个小和尚	1
二、行走于城乡之间	20
三、新的学校新的家	44
四、小学生碰上了“大跃进”	66
五、记住一个词叫“饥饿”	86
六、这儿的老师称“先生”	107
七、我被“文革”撞了一下腰	141
八、挤上“大接见”的末班车	164
九、稀里糊涂变成“保守派”	196
十、北京不欢迎我们	220
十一、从“三忠于”混入“工宣队”	252
十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281
十三、“积代会”一直开到省里	317
十四、焊枪举处千星落	354
十五、那一年的事儿特别多	388
十六、改变人生的一次考试	418

十七、我与西湖有个约会·····	436
十八、西行千里至嘉陵江·····	475
十九、长江中原兜上一圈·····	503
二十、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30
二十一、为伊消得人憔悴·····	568
二十二、愿天国的母亲快乐·····	597
后记·····	622

一、普陀山逃走个小和尚

我的故乡湖州，是太湖南岸一座有 2300 余年历史的小城。春秋时期楚国春申君始在此设菰城县，秦始皇一统天下改称乌程县。三国时东吴在此设吴兴郡，隋朝开始称湖州，以后历朝均设湖州路、湖州府。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废府建县称为吴兴县，湖州市（有时称镇）则为吴兴县所辖。解放后，先后设浙江第一专区、嘉兴专区和嘉兴地区。1983 年撤地建市，湖州一变成成为地级市。2003 年始，湖州管辖吴兴、南浔两区与长兴、安吉、德清三县。但城内老居民口中的“湖州”，指的却是今日城区的范围，至多扩展至旧时的吴兴县。

自小至今，除了外出上学及去农村插队落户那几年外，我在小城中度过了绝大多数的岁月，在此酿造出许多五味杂陈的生活故事。

把我带到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的，乃是我的父亲与母亲。在他们各自人生轨迹的某一处转角上，一个常有的“偶然”便有了我。在我 60 余年的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两位老人家的身影，并在许多地方对我产生这样那样的重大影响。

1. 我出生即从父亲的姓，姓“董”。关于“董”姓的来历，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相传黄帝的子孙中有个叫董父的，为帝舜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封之于总川（今山东定陶县），他的后代便以董为姓。另一说是春秋时，周大夫辛有的两个儿子到晋国，与籍氏一起主管晋之典籍，因其职责是“董督晋史”，所以也被称为董氏。当时晋国的都城在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故董氏出自今山西翼城。不管何种说法可靠，反正这董姓的历史渊源确实有些久远，且分布甚广。前几年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在全国常见的 100 个姓氏中，若以姓氏总人口排列，董姓以 793 万人位居第 29 位，挤进前 1/3，也算是一个大姓。

我这一支董姓家族诞生于何处？何时何地迁居到这江南小城湖州来？这些问题现在已无从查考。记得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家中购置了一对挑水的大木桶，外公曾让我在木桶外写上“陇西”两字，当时我问过外公这

是何意，外公说这是我家“董”姓的发源地。直到后来上大学，我才知道“陇西”乃是董姓的“郡望”，就是说董姓最早发源于陇西，后来分析散迁于各地。如此说来，源于陇西的董姓才是正宗行货，其余者则属于“山寨”版的水货。我又在辞典上查过，陇西即指今日之甘肃一带，我的老祖宗们如何从那西北高地不远万里来到这太湖南岸，其中的艰难曲折却已无法查证。

我父亲的回忆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他的爷爷，即我的曾祖父一代。估计大约在清末，我的家族已在湖州生活，到现在也有了100年可追溯的历史。100年前家族中是否出现过高官显贵、闻贤名人？我自少年时起即经常向我的父母发问，显然是希望能从中扯出一两位极有声望的老祖宗，能让我在同伴与同学面前炫耀一番，可惜每回总是失望。前几年，湖州师院有一位同事正从事一项科研工作，对明代湖州籍的一位高官名曰董份的进行综合研究，曾问我的家族与这董份是否有关联，我却只能摇头以对。一是实无典籍可佐证；二是董份的官声并不佳，就是扯上关系也没什么荣耀感。

曾祖父名曰董敬珊，曾祖母钱氏，但我没见过他们，早在我出生前10余年，两位老人家即已故世，有关他们的情况我只能听我父亲转叙。曾祖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很小即去瓷器店里“学生意”（做学徒）。据说为人十分厚道谨慎，故生意做得很好。在上世纪20年代时，他已在湖州较大的一家瓷器店里拥有相当的股份，还在江西景德镇买下了两处瓷窑。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表述，这属于“商业资本润透于生产企业”的经营模式。曾祖父手上积下一大笔钱后，在上世纪30年代初，于湖州南街今市中医院对面的淘沙巷内，置下了一处房产。拿今天的眼光看，曾祖父主家时我家应当属于一个殷实的富商家庭。过了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一次，苏州的小叔到湖州做客，曾领我到淘沙巷的老宅一带去看过。巷内的围墙上，还砌着一块“董敦和堂界”的条石。小叔指着连在一起的10多间房屋，说这就是当年的祖居。可是，过了没几年便碰上城市“拆迁改造”的高潮，淘沙巷一带全被毁成平地，造起高楼。这写着堂名的条石，也不知被扔到哪个角落去了。

曾祖父在世时，还在湖州城区南郊约10余里处买下一处坟山，此山紧依“京杭国道”（现为104国道），至今仍称“董家山”。曾祖父、曾祖母死后就葬此山上。少年时逢清明节，我常随父母前去扫墓，还记得一进入墓区处路旁建有一座土地庙。曾祖父的墓前有高大的石碑、厚重的供桌，

墓道也很宽，墓旁还种着一株很高的樟树。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家的坟亲就来告诉我们：墓碑、供桌被当地农民抬走了，墓道的石料也被农民挖走去修猪棚，仅留下一座墓堆。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墓也被挖开个大洞，有人想寻找什么“宝贝”。结果没发现值钱东西，便用泥土草草填上。那年代活着的人都自顾不暇，哪儿有时间与精力去管什么祖坟。现在，我们兄弟姐妹每逢清明节给祖父母扫墓时，也常顺便走几步给未曾见过面的曾祖父、曾祖母烧上一堆纸钱。

曾祖母一生未曾生育，为了延续董家的香火，于是抱养了一个小男孩，那即是我的祖父。祖父原姓什么？家居何处？父母亲作何营生？这些问题连祖父自己也不知道，我当然更是无从知晓。但我却明白一桩事，就是我这董姓血统，其实在我祖父那儿已经不纯正了。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到底是什么姓氏的血脉，看来只有老天知道。

曾祖父为祖父起名为董幼珊，祖父另有一小名叫作“和尚”。因为湖州有一种旧俗，若家有很珍贵的男孩（如独子），又担心他生病夭折，可起个贱名如阿猫、阿狗之类，如此便容易养大。故比我大一辈的人中，叫阿狗、阿牛、阿咪（猫）、阿土之类的特别多。如我妻子的哥哥，是我岳父母家中唯一的男孩，遂有个小名叫“阿汪”，也就是小狗的意思。曾祖父给孩子取名和尚，大约便出自类似的考虑。和尚是出家人，有神佛保佑，自然少病没灾。

祖父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况且家境富裕，自然自小娇生惯养，以致他一生谨慎胆小、能力极弱。祖父一生从未做过什么固定营生。听父亲说，祖父年轻时也经过商，与人合伙开过南货店，岂料不到半年，合伙人便告诉他连本钱都亏光了，他却不声不响地接受此种结局。类似情况有过两三次后，他便干脆赋闲在家，甚至在解放后也从未参加过工作，直至故世。在他年少与年轻时，有曾祖父在外经商持家。曾祖父死后，我父亲即担起主家的责任，祖父便依赖儿女供养。我自小与祖父接触很少，上世纪70年代时，因家中住房太狭窄，曾到湖州府庙前他的居处和他同住了近一年。那时他大约70岁上下，只见他一早起来，泡上一壶茶，便静静地坐着不动。我劝他上街走走，他答曰：“算了吧！让车子撞一下就倒霉了。”我又劝他坐到天井里去，总比闷在昏暗的小屋中好些。谁知他又说：“坐在天井里搞不好屋顶掉下个瓦片，找谁算账？”

他老人家年轻时靠曾祖父的庇护享了些福，中年以后全赖儿女供养。

虽然日子清苦，却没有任何工作与家庭的压力。一直活到整 80 岁那年，又静静地离开这尘世，这也算是一种别样人生。甚至在他死后父亲与我为他办理丧事时，竟连一张遗像都无处寻找，因为他老人家一生中未照过一次相。祖父长大成人后，便由曾祖父操持着给他成了家。祖母名叫潘翠娥，也是湖州本地人。据父亲说，祖母的父亲是湖州城内一家较大规模当铺的股东之一。祖母有一个哥哥在当时的政府机关里工作，是什么科长，相当于今日的公务员。祖母小时还上过三四年女子小学，能读书识字。祖母出嫁时还带来一个随身服侍的丫环，可见祖母娘家的家境应该相当的殷实。祖母嫁到董家后，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可惜身体欠佳，不知患了什么病，只活了 53 岁便死去。祖母死时我已 5 岁，故还依稀地保留着她的一些印象。

父亲出生于 1926 年 1 月 10 日（农历 1925 年十二月十六），在 5 兄妹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二弟一妹。父亲出生后被起名兆征，算命的说其命中缺水，旧俗说命中缺什么可用带水的小名来弥补，于是起个小名叫水宝，也叫阿水。我的两个叔叔叫兆鑫、兆森，大约父亲这一辈为“兆”字辈。两个姑姑叫莉瑾、蕙瑾，大约旧时女子是嫁出去的人，不必按族内辈分起名的缘故吧。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在家中找到过一份手抄的《敦和堂董氏家谱》，当时也看不大懂，只记得上面有“兆龙、兆熊”等名字。后来问起我父亲，说这是他的几位堂兄，都在上海，若仍健在的话，应是 90 岁开外的老人了。

解放初流行改旧名，使名字中体现出“时代特色”，于是父亲改名为“立群”，两个叔叔改为“立志”、“立民”。从此，父亲一直使用新名，只有一些老亲戚才称父亲“兆征”。

父亲算是祖父一房的长房长孙，出生时曾祖父健在，家道尚可，还特地买了个丫环专门抱他，有点类似今日之“小保姆”。父亲小时上的已是新式学校，但念到初二时，由于曾祖父去世，祖父又不理营生，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曾祖父持有股份的瓷器店也宣告破产，家庭经济顿时拮据起来，父亲便就此辍学。

按照湖州城里的传统，父亲在 13 岁时便去了一家名曰“汇康”的油行开始“学生意”（当学徒）。旧时“学生意”非常不易，进店须有“保人”担保。每天早上，学徒必须第一个起床，打扫内外卫生，擦拭柜台、桌椅，卸下店铺门板，商店开始营业。但此时，学徒还没资格“上岗”，只是干

些跑腿打杂、担水做饭的事情。若老板家中有小孩，还必须或背或抱孩子，兼任小保姆的角色。连老板的尿壶，也理所当然地须由“学生意”的天天冲洗。晚上则须守在店里，要等到老板、伙计们回家才能休息。睡觉没有床铺，须搭个“早起晚搭”的临时铺睡在店堂里，权充值班门卫。在那三年“学生意”的日子中，若有贪小、偷懒、怠倦等不良表现，引起老板不满，老板一句话可将你辞退。而且对师傅还必须“从一而终”，学徒绝不能中途“跳槽”，另换一家店铺，或另换一个行业。湖州民间称此为“吃回汤豆腐干”，那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要说本人再找家店铺“学生意”会很困难，就连做父母的也会在邻里亲戚中抬不起头来。所以，不管“学生意”时的生活如何艰苦，学徒都必须咬牙坚持。

在店铺“学生意”者，一般三年满师后，穿上长衫，才有资格接待顾客，百姓俗称“长布衫”。而当时在工厂干活的话，穿的则是上衣下裤，俗称“短打扮”。不仅两者的衣饰不同，社会地位亦有如今日“白领”与“蓝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父亲在汇康油行“学生意”熬过三年，总算能独立待客。但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本来就是充满理想与幻想的时期，在小城湖州的一个油行（实际上即是一个油店）中，每天给顾客一斤两斤地打油，实在乏味无趣。毕竟父亲也上过一年多中学，在那时已算不低的学历，已知道世界上有七大洲、四大洋，知道有英吉利、美利坚与法兰西，甚至还会念上几句“英格里西”，算是一个新式的小知识分子。加上当时已有电影、报纸、无线电广播等各种传媒工具，湖州又临近上海、杭州等大都市，各种外埠城市的消息经常传



年轻时的父亲

来，势必使我父亲心中产生向往与波动，总想摆脱这单调乏味的油店伙计生活，到大城市去“换一种活法”。

1945年8月，父亲从报上看到一则招生启事，说上海有一所宪兵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学兵，还说了一大通好男儿志在报效国家、学校毕业后如何优厚待遇之类的话。这些对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自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与吸引力，加之学校地点又在上海，年轻人都向往都市生活，如同今日“北上